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陈子丹/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陈子丹/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陈子丹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 - 7 - 5482 - 0904 - 1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少数民族—历史档案—
档案资料—研究—中国 IV. ①G275.1②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5555 号

责任编辑：李 红
装帧设计：刘 雨 王睿韬
责任印制：张爱成

书 名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作 者	陈子丹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650091）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650034）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0871 - 4113185
网 址	http: //www. ynup. com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market@ ynup. com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25
字 数	341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904 - 1
定 价	56. 00 元

作者小传

陈子丹，男，汉族，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档案学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学、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等学科的研究。主攻民族档案史料学方向，其研究成果涉及少数民族文字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口述档案、影像档案、地方特色档案以及中外档案和档案工作等领域，对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研究成绩显著。对民族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6篇，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39篇，出版教材1部、专著2部、合著2部。主持完成国家级项目1项、省级项目3项、校级项目2项；参与国家级项目5项。教学和科研成果多次获省、校级奖励。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17)
第一节 史料与档案史料	(17)
第二节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29)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68)
第二章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	(77)
第一节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的内容	(77)
第二节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的类型	(81)
第三节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的方法	(85)
第三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历史与现状	(88)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	(88)
第二节 现代和当代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	(98)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略	(106)

第四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方法与技术	(117)
第一节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方法	(117)
第二节 少数民族档案编研方法的探讨	(139)
第三节 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数据库的建设	(145)
第五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译注与出版	(159)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译注与出版的内容、意义和方式	(159)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译注	(166)
第三节 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出版	(187)
第六章 满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公布	(193)
第一节 明清两朝对满族档案史料的汇编和公布	(193)
第二节 民国时期满族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	(197)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00)
第七章 藏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10)
第一节 古代对藏族档案文献的编研	(210)
第二节 现当代对藏族档案文献的编研	(212)
第三节 近年来出版的藏族重要档案文献汇编	(223)
第八章 彝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29)
第一节 西南彝文档案史料的编译出版	(229)
第二节 西南汉文彝族档案史料的编研利用	(238)

第九章 傣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52)
第一节 傣文档案史料的译注出版	(252)
第二节 汉文傣族档案史料的公布	(260)
第十章 白族、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77)
第一节 白族档案文献编纂概况	(277)
第二节 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	(287)
第十一章 蒙古族、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97)
第一节 蒙古族档案文献的编纂	(297)
第二节 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利用	(306)
第十二章 壮族、瑶族、羌族、撒拉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319)
第一节 壮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319)
第二节 瑶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322)
第三节 羌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327)
第四节 撒拉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330)
主要参考文献	(333)
后 记	(336)

绪 论

在我国档案界,有人认为“‘编纂’、‘编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档案文献编纂是整个档案馆(室)编研工作的一部分”^①。但也有人认为,“编纂、编研在基本同义的理解上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两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排斥或相互从属的关系。虽然,根据习惯叫法的不同,编纂、编研在档案界同时混用是无可非议的,但从术语规范上看,一般还是应以编纂作为规范的学术术语为宜。因为现在社会上大多承认编研中的‘编’即是‘编纂’,而且,在编纂、编辑、编写三者中,只有编纂一词能包括抄纂、编写两方面的内容,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与编辑相通”^②。本书对“编纂”、“编研”的理解基本倾向于后者。认为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亦可称之为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研,它既是档案部门或非档案部门(包括图书、文博、民族、科研、教育部门等)以馆(室)藏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为主要物质对象,以主动提供或报道少数民族档案信息内容为主要目的,在熟悉并深入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汇编和出版少数民族档案资料汇集、文集和编辑专题史料,编写各种参考资料和检索工具,参加民族研究和编史修志,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撰写文章和著作等,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工作,又是围绕一定的题目范围,对收集挑选出来的少数民族档案文件进行考订、加工、编排和编辑出版,使原材料转化为不同形式的成品或半成品,以方便广大读者利用的工作,即编辑、加工、输出少数民族档案信息,主动、广泛、便捷地向社会各方面提供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服务的一项专门工作。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是以现有少数民族档案史料为物质对象,根据档

① 刘耿生:《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② 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案的状况、客观需要以及编者的水平,选择一定时间内有较大查考利用价值的档案史料,采用不同方式,对档案史料的内容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信息开发工作,形成受益面广、传递速度快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产品。

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工作是一种具有较高层次和较高效能的少数民族档案提供利用方式,是保护少数民族档案原件和长久流传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有效措施,也是民族地区档案馆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的重要体现,是挖掘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加强编纂工作,提高编研水平,揭示和介绍馆藏内容,不仅是开发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方式,而且是衡量民族地区档案馆(室)工作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提高档案馆社会地位和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就是围绕“编”和“纂”的主要工作环节或工作过程。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环节:①编纂选题;②查找与挑选;③考证、校勘和加工;④标题的修拟与编排;⑤辅文的撰写;⑥汇编的出版。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不断应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将发生许多全新的变化,电子出版物、光盘数据库、多媒体技术、数码影像技术、网上公布等,对传统的档案史料编纂方式方法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也促使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学必须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为它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是各民族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少数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宗教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知识信息资源,是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和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区)的重要条件之一。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是少数民族档案整理的高级阶段,对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今后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克服少数民族档案在提供利用方面诸多不便因素的有效措施,尤其是使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与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区)

相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研，不仅有助于挖掘地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反映出民族特色，弘扬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组成，很多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很丰富。中国多民族的包容性与地域辽阔，便于迂回的优势，使大量古籍和档案文献得以保留，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历经战乱、天灾与动乱而幸存的古籍和档案文献，却因日益恶劣的环境与维护不力而被严重毁坏，或成砖成渣，或脆化虫蛀，或霉变退色，亟需抢救。抢救整理民族古籍和档案文献，就是要从文献史料中继承和弘扬各民族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编辑出版民族档案史料是关系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事。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档案史料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批准人民政府进行少数民族大调查，还拍了纪录片。从 1950 年至 1970 年，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先后完成了 16 个少数民族的 21 部电影作品的摄制，片长达 123 本，时长约 1230 分钟。现在，片中记录的许多历史镜头已经不存在了。国务院成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以后，在古籍档案保护和抢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少数民族古籍档案保护工作走上了正轨。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要“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国家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编纂公布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档案史料，既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内容之一，更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它可以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广泛的信息来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编研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编研和开发利用又可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少

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加快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速度、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步伐、提高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既是繁荣少数民族科学文化事业,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档案法》赋予档案部门的一项光荣使命,尽快开发可以利用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促进民族档案事业本身的发展。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挖掘整理好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好少数民族档案方面的书刊,能让少数民族档案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几代档案工作者的心愿,也是一件修文存史、嘉惠学人、永泽后世的伟业。

二

满族十分重视本民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早在皇太极时期就编纂了《满洲实录》、《太祖实录》。满族入关前还编纂了《满文老档》和《国史院档》。《满文老档》不仅是满文创制以来的第一部满文文献,也是满族最早的一部档案文献。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组织编纂了大量起居注、实录、圣训、谕旨、奏议、会典、方略等书,在档案文件的汇编方面成绩显著。从20世纪30年代起,罗振玉、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等个人和单位先后编印了一批清代满族历史档案,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贡献较大,连续编纂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文献专刊》、《文献论丛》等专题汇编,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出版各种汇编成果50余种,370多册。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编印了《明清史料》,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了多种档案资料汇编。此外还有《清史稿》的著成和《清实录》的刊行。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满族历史档案最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1925年至2003年累计公布档案达64万件。2003年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后,对清代满文档案和汉文文献以及国外有关清史的外文文献和档案进行空前规模的编译、公布和出版,估计字数将在几亿到几十亿之间,将会出版上千种不同的书籍。

藏族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研由来已久。古代藏族和汉族都对藏汉文文献的编纂作出了贡献。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学者编译的《新疆的藏文史料》、《敦煌文书中之吐蕃史料》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纂公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为传统藏学研究提供了大批丰富、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西藏与祖国关系史料汇编》、《藏文史料译文集》、《铁虎清册》、《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图说百年西藏》的编辑出版格外引人注目。一大批藏学家和史学家利用藏汉文历史档案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参加编史修志,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和确凿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彝族档案文献的编译研究应始于西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收录了东汉时川西南部落首领白狼王创作的《白狼王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也引用了彝文文献。元明清时期,“四夷馆”和彝族上层知识分子也参与了彝文文献的编译。1936年出版的《彝文丛刊》(丁文江与罗文笔合译)意义重大。近年来,云、贵、川三省对收集到的彝文档案史料进行了大量的译注出版工作,贵州毕节地区行署成立了彝文编译组,编译了《西南彝志》、《物始纪略》、《水西全传》等彝文文献,四川省编译了《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尔比尔吉》(凉山彝文资料选译),云南编辑了《彝文文献译注》、《彝文石刻译选》、《云南彝族氏族谱牒译注》以及享誉中外的彝族著名叙事长诗《阿诗玛》和“阿诗玛文化研究丛书”等。对西南汉文彝族档案文献的编研利用也做了大量工作,为研究西南民族史、彝族史和编纂《彝族通史》、《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出版物。

蒙古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最早始于《蒙古秘史》的编纂,明朝利用元朝档案撰修了《元史》,清朝官修的史书中收录了许多有关卫拉特的历史文献,民国时又编纂了《新元史》。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档案文献编纂一手抓汉文档案编研,一手抓蒙文档案编研,先后出版了《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资料选编》等编研成果。1999年还出版了120万字的《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资料汇编》,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

在内蒙古档案史上尚属首例，此书的问世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工作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此外，在八思巴文文献、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托忒蒙古文文献的编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近年来编纂的“成吉思汗八白室系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部门首次公开出版的大型蒙古文历史档案文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最早见于元代《秘书监志》中收录的“回回书目”，明清时期，正史及实录、起居注、方略中均有关于回民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后，白寿彝先生整理出版了《咸同滇变见闻录》、《回民起义》等史料。近年来，在回族书籍类、铭刻类、文书档案类、口碑类古籍文献的编纂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出版了“南方回族古籍丛书”、《回回古代全书》、《中国回族金石录》、《清代穆斯林档案》、《云南回民起义史料》、《郑和家世资料》、《郑和史诗》（大型画册）等一批重要成果。

白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最早始于宋元时期用“白文”编纂的史志文献，如《白古通记》虽是一部南诏、大理国史，但由于它记载了历代统治家族世系名号、年代及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因而又是一种大事记性质的档案文献，后来成为明代《滇载记》、清代《爨古通纪浅述》等书编纂的蓝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理地区十分重视白族文献的编纂公布，在方块白文文献、碑刻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等方面的汇编成果十分丰富，先后完成了《白族民间文艺集成》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的浩大工程。特别是《大理丛书·金石篇》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白族的“永乐大典”。

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可追溯到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编纂的一些史料文献，如《木氏宦谱》、《木氏六公传》、《皇明恩伦录》等。1981年东巴文化研究室成立后，坚持对东巴经进行长期不懈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完成了数千种东巴经的记音记义和对译意译工作，刊印出版了多种东巴经译注本，摄制了东巴教仪式录像带，录制了东巴祭司诵经录音带，完成了东巴教仪式规程文字的记写、翻译和整理。经过老东巴和研究人员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于2001年出版了千册百卷本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是我国跨世纪的一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和出版工程，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

事，堪称东巴文化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傣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在新中国成立前成果很少，只在史志文献中全文或部分刊录了一些汉文傣族史料。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傣文史料翻译组，先后译出了20万字的史料。80年代后，在傣文古籍、文书、官印、金石铭文的译注出版以及汉文傣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公布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和丰硕成果，出版了《德宏史志资料》、《版纳文史资料选辑》、《中国傣族史料辑要》、《中国云南德宏、耿马傣文古籍编目》等一批文献材料，2002年又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贝叶经整理出版工程，将陆续出版多达百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

壮族档案史料的编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经过广大编辑出版人员20多年的精心编纂和出版，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先后完成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壮族历代史料荟萃》、《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等一批汇编成果。200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了“壮学丛书”的编纂计划，成立了编纂机构。该丛书是系统整理和研究壮族社会文化的综合性学术丛书，由研究资料和研究专著两大部分组成。研究资料部分主要搜集整理壮族主要的典籍、资料、人物著作及民歌古籍，编纂辞书，保存壮族文化遗产，供人们阅读和研究之用。首批研究成果《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已问世。

撒拉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早在明代就开始见诸于汉文官方文献中，现在保存的有关撒拉族的明朝、清朝、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汇编较为丰富。从20世纪60年代起，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先后编纂出版或内部铅印了《明实录、清实录撒拉族史料摘抄》、《撒拉族档案史料》、《撒拉族史料辑录》等成果。由撒拉族专家学者承担的项目《撒拉族史料集》、《撒拉族文献编译》，将对历史上形成的撒拉族史料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

畲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编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后来少数民族故事、民歌、谚语等集成系列丛书的出版，抢救了一大批民族文化，保存了不少畲族史料。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或地域等原因，畲族档案史料的收集和开发利用还显得较为滞后。近年来，随着畲族地区档案编研工作的开展，一批新的成果相继面世，如《畲族祖图族谱》、《畲族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广东畲族古籍资料汇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